



## 卸新任校長交接 陳定銘校長 以心靈環保為治校理念

◎本刊訊

法鼓文理學院卸新任校長交接典禮於7月31日在海印三昧舉行，學校董事長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監交印信、頒發校長聘書，由本校學群長陳定銘教授接任第3任校長。交接典禮以露天音樂會的方式呈現，由新逸交響樂團、悅音合唱團、法鼓合唱團等優美的演奏與演唱獻上祝福。學校同仁特別製作感謝影片致贈惠敏校長，本校第1任籌備處主任李志夫教授亦應邀特地前來，許多畢業校友也返校參與，現場500多位嘉賓一同觀禮見證。

惠敏校長帶領本校15個年頭，致詞時以「感恩、懺悔、祝福」總結，並向大眾合掌深深致謝。惠敏法師自1992年受聖嚴師父所託，進入法鼓山大學教育體系迄今正好屆滿三十年，期間推動佛學與數位資



▲ 本校卸新任校長交接典禮由學校董事長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中）監交印信，右為卸任校長惠敏法師，左為新任校長陳定銘教授。（李東陽、張曜鐘攝）

訊整合，將大藏經數位化並廣為流通，可謂劃時代之貢獻。同時亦推動佛學研究國際化，曾在校舉辦素有「佛學奧林匹克」美譽之IABS國際佛學會議，近年則結合佛學與科技，比如腦科學研究、安寧療護等。惠敏法師三十年來為教育而付出的奉獻旅程是筆路藍縷卻處世自在，師生所領受的，是一位春風化雨的微笑校長。

新任校長陳定銘教授學經歷及著作豐富，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博士。曾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公民社會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執行委員、第三部門學刊總編輯、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公共治理績效評鑑委員等。2015年本校招收第1屆人文社會學群碩士研究生，同年向國立中央大學借調陳定銘教授來校，協助擔任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主任，2018年再接任人社學群之學群長。

陳定銘校長致詞時表達其治校理念，在現今少子化競爭的時代，學校應依據自身特色，以心靈環保回應時代需求，以禪法體悟與運用生活智慧，促進心靈健康。日後更將持續實踐創辦人聖嚴法師的辦學期許，以漢傳佛教特色為興學主軸、三大教育環環相扣與相互支持、多元化與多層次經營、優秀師資與法鼓山理念互為加乘效果，以及創新為最大特色。

## 110學年畢結業典禮 師生送祝福

◎林靖綾

110學年度畢結業典禮於6月11日在大慧館登場，69位畢結業生和大眾一同吟唱〈三寶歌〉揭開序幕，方丈和尚果暉法師以「道心、健康、學問」6字予以勉勵，並致贈其新書《平安最幸福》與每位畢結業生結緣；同時，也感念即將榮退的校長惠敏法師，多年來為學校付出辛勞，更以此期盼畢結業生，莫忘本懷，利己利人。校長惠敏法師也以菩薩衣的寓意祝福



▲ 惠敏校長（右）為畢結業生撥穗。（張曜鐘攝）

畢結業生，如海東青一般，鵬程萬里，更以「法鼓頌」內容和師生共勉、期許未來。頒發畢業證書的過程中，校長與師長們為畢結業生撥穗、搭菩薩衣，猶如慈母與遊子般，陪伴畢結業生們踏上新的旅途。畢業生也透過致詞、學習成果影片來感恩師長們的教誨。

此外，畢聯會亦在典禮前舉辦一系列的歡送活動，將在校內對於畢業生的祝福化為具體行動，也呼應了這次的畢業主題「轉轉心世界」。6月7、8日連續兩天中午於餐廳外舉辦溫馨的「祝福康樂隊」和「音樂小沙龍」兩場音樂會，除了有師生的個人彈唱，也有跨系的團體大合唱，並以現場直播的方式傳達全校，現場充滿了無限的心意與祝福。典禮當日，畢聯會亦精心準備了豐盛的午宴，帶給畢業生們一份難忘的回憶。畢業，並不表示結束，而是一趟新旅程的開始。

## 跨領域對話學術研討會 心靈環保30週年

◎顏美惠

2022年適逢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提出「心靈環保」30週年，本校於6月30日至7月1日舉辦「2022心靈環保跨領域對話學術研討會」，以心靈環保為主題，邀請各學門專家進行跨領域之對談。因應疫情，採現場直播與視訊連線同步之方式，共48位學者與170位觀眾參與盛會，展現出大眾對心靈環保能否回應社會問題之高度關注與好奇。

研討會首日，大會特別邀請台北大學前校長薛富井教授以「心靈環保：覺醒與啟蒙」進行主題演講拉開序幕，其後，研討會分為「心靈環保與人文學科」、「心靈環保與社會科學」以及「心靈環保與經營管理」3個子題，共計26篇學術論文發表，從佛法理路、公案、

禪修弘化、哲學、倫理、社會心理、談判、老人照護、綠色永續、社會企業以及管理策略、經濟學、企業文化等眾多層面，各自依循心靈環保、心五四、心六倫的觀念、方法與落實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一般研討會中，發表者與回應者通常是相同專業領域之學者，然此研討會特別安排不同學門的學者來回應，故而不只是學者進行心靈環保跨領域的研究，同時讓發表與回應過程更進一步激盪出不同學門觀點的火花。

兩天的研討會，經由各個不同學門的相接、對話，讓心靈環保跨越認知藩籬而得到落實的種種可能與發展，窺見心靈環保與社會議題的緊密交會，以及未來的學術貢獻。

# 《法鼓學園》歌曲緣起

十多年前，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主任劉安之校長提起：因為聖嚴師父捨報圓寂了，問敝人可否提供歌詞，以便找音樂人創作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校歌」。敝人回答：我無此才德，無法擔任此重任，但建議：若有需要，可暫用聖嚴師父作詞《法鼓頌》歌曲：

法鼓法音，響徹宇宙；金山有鑽，永不憂愁；  
法乳常哺，法水長流；三界眾生，苦海回頭。  
祥雲法雨，普潤大千；十方三寶，心中自現；  
作育龍象，遊化人間；禪修念佛，一念萬年。  
修福修慧，菩薩道路；提昇人品，建設淨土；  
修學佛法，分明因果；救濟眾生，慈航普度。  
法鼓山呀！鼓在何處？弘法護法，就是法鼓；  
法鼓山呀！誰敲法鼓？你我和他，都敲法鼓。

【後二段反覆】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014年，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與法鼓佛教學院合併為法鼓文理學院之後，一些典禮有使用《法鼓頌》，但是它屬於合唱團表演曲目，歌詞豐富，一般人難記憶，也難唱出氣勢，作為「校歌」有其困難度。

3年多前，法鼓佛教學院碩士康吉良老師主動提起可為學校作「校歌」，請我提供歌詞，我也是回答：無法擔任此重任，請他就聖嚴師父的著作中取材，因為一些法鼓山相關的歌曲，也是作者或弟子們從師父的著作中集句編成的。

今年，他又向我提起此事，我想到：或許可以從《法鼓頌》摘錄，融入「校訓」與「心靈環保」等字句，取名為《法鼓學園》，類似《法鼓頌》「袖珍版／校園版」，容易朗朗上口。

金山法鼓，響徹天地；心靈環保，悲智和敬。  
博雅教育，化育龍象，遊化人間，修福修慧。

法鼓學園！鼓在何處？弘法護法，就是法鼓；  
法鼓學林！誰敲法鼓？你我和他，都敲法鼓。

最近，康吉良老師完成了作曲，並請人編曲、混音，可用不同方式演唱或演奏，大家可隨緣運用。若有因緣成為校歌候選，其歌詞可與「創辦人」連結，是一種紀念意義。若因緣不足，也是可增加一首「淨化心靈、振奮人心」的校園歌曲，善莫大焉。



樂譜、錄音檔下載：  
<https://reurl.cc/eOxM0b>



## 一條走了三十年的路 一本回應心靈環保三十週年的專書

學術

動態

辜琮瑜／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暨大願・校史館主任

最初啟動想要整理「心靈環保」的動機，應該是法鼓文理學院開設了必修課「心靈環保講座」，並於2016年負責講述心靈環保的內容而肇端於心。記得當時只是先整理心靈環保的方方面面，就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而那也是累積很久的疑惑。

經常在法鼓山大普化教育分享佛法，每每問及在場的參與者：「何謂心靈環保？」常會得到許多模糊或不確定的答

案，一種瞠目結舌無法回應，卻又焦急說出「十分受用」的感慨。似乎是內化了、運用了，卻又言語無法明之。然而，心靈環保不是法鼓山的核心理念嗎？不是經常出現在活動或課程中的名稱嗎？問及校內學生，何謂心靈環保？一樣會得到相類似的回應，而，心靈環保不是這所學校的辦學理念嗎？

於是在往後每一年的講座，以此為題嘗試不同面向的探索

與彙整，並將別人口中幾句話就好像可以說過去的心靈環保，寫成了稱為「心靈環保學」的內容。將一個像是運動、活動、標題、標語、口號或品牌般的內涵，當做研究議題，最終以《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意義與開展》專書面世。

隨著講座陸續整理出心靈環保的「心地圖」、「心視野」、「心靈環保生命教育芻議」、「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與整體教育觀」、「聖嚴法師心靈

環保學與終身學習」等主題，就幾次講座內容重新架構、整理、論述，從中發現除原本的資料，有更多內涵與論述需深入探討，方能對應不同範疇的連結，也希望更周全回應時人對「心靈環保」的誤解或簡化。

探研過程中，發現其中有深刻的佛法脈絡，有應世化世的古老智慧當代語彙之轉換，能系統的彙編、也有超越系統的開放與開展，故而完成這本試圖以「心靈環保」做為介面與



▲ 辜琮瑜老師新作《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意義與開展》於今年5月出版。

平台，契入法師思想的全面探究。

研究、整理與撰寫的過程中，愈發體會其中的如海智慧，實非一本「心靈環保學」得以承載，於是退而以概論之想為之。至於深刻的底蘊與完備的內容，則有待未來以不同主題繼續探研，以符應「開展」的意義與作用。

## 漢傳佛教的療癒之道

梅靜軒／佛教學系副教授暨學術出版組組長

從古至今，無人能逃脫死神的羅網。死亡，是所有人類共同的永恆課題。疾病也從來不只是肉體細胞的變異、腐朽；疾病所牽動的不安煩惱，更是人生要面對的巨大顛簸難關。佛法並非萬靈丹，然而佛法可以是一帖解藥，解答了生、老、病、死，解答了困頓無常，解答了緣起、生滅。因為法藥的洗禮，人生可以闊達，可以寧靜致遠、寂靜安詳。

「佛教醫學」是佛學研究中

的一個新興領域，也可被歸類在人文醫學的範疇下。佛學醫學所探究的是與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關的各種層面的問題，它涉及了教義思維、經典解讀、宗教實踐乃至社會文化等，與面對生死、疾病治療有關的一切。漢傳佛教傳統下的佛教醫學研究並不涉及臨床應用目的，所以本書所談的佛教醫學，比較單純地屬於文獻梳理性質，或者說是對中國歷來傳譯的佛教醫療知識與修持實踐的探索。

佛法浩瀚如海，三藏中有多少是與佛教醫學主題相關的教法呢？因為這將牽涉到佛教醫學的定義，目前尚無現成的標準來衡量篩選。或許可以暫時嘗試從經典文本、教義思想、佛門人物、寺院機構、佛法實踐等不同的面向來探討。透過經典與教義的梳理，我們將能對生死、對疾病的本質有一種法的觀察視角，進而掌握形色變異之苦的消解之道。又從佛教實踐角度來說，關注醫療有助於我們了解過去佛教僧俗修



▲ 梅靜軒老師新作《漢傳佛教的療癒之道》於今年6月出版。

行者與社群之間，共同面對各種疾病的方式與努力。

雖說命在旦夕、呼吸之間，

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生死多半不是一拍兩瞪眼的乾脆了當事。生命的無常，使得必死卻又不知何時會死的人生，充滿了變數與挑戰，忐忑與不安。老與病是橫亙在生死之間的層層難關，如鯁在喉，似乎觸手可及卻又萬般艱難；細數下來都是椎心刺骨的痛，都是血淚斑斑。佛教醫學最重要的意義，則在於能將佛法教導落實在生活中，使行持成為日常，以服食法藥為最上乘的養生方。

# 2022法鼓數典專案 春季發表會

◎陳陶

由本校圖書資訊館主辦的「法鼓數典專案春季發表會」於4月22日採線上方式舉辦，發表過去一年來數位專案的階段性成果，目的是及早公開還在開發中的專案，讓使用者及早利用這些資料並回饋意見，藉此讓專案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本次春季發表會共發表5項專案。首項專案是華嚴專宗學院院長賢度法師發表「因陀羅網與無盡緣起：臺灣三位華嚴僧人著作資料庫」，是自2012年迄今，華嚴蓮社與本校資訊組十年數位化合作的成果。賢度法師非常支持佛典數位化，認為「運用現代的科技設備培養知識教學人才，這是現代弘法的一大課題。」臺灣3位華嚴僧人分別是南亭和尚、成一和尚、賢度法師，皆是具法脈相承的3位華嚴宗大德，皆是著作等身。

第2專案是圖書資訊館館長洪振洲老師發表「CBETA online 2021連結與創新」，2021年新增《太虛大師全集》



▲ 圖書資訊館館長洪振洲老師線上發表「CBETA online 2021連結與創新」，介紹2021年搜尋關鍵字Top20。

與收錄國圖珍藏善本佛典，持續不斷在經文品質與數量上投注心力，未來AI人工智能之應用也是CBETA經營之重點。第3專案是研究助理謝承恩

報告「口袋中的寶山：法鼓全集行動版」，此為法鼓全集2020紀念版之電子版，於2021年11月1日上線。相較於舊版，新增了《聖嚴法師年譜》等，不僅改良了界面，亦可應用在行動裝置之中。

第4專案是佛教學系王昱鈞老師發表「佛典與AI：文字處理應用實例」，王老師是自然語言處理的專家，訓練機器像人類一樣具有學習、識別、甚至預測答案的能力。王老師認為佛典結合AI有無限可能，可實現很多的

研究面向。第5專案是研究助理林靜慧報告「大家來找查：敦煌寫本比一比」，是由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比利時根特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合作，選擇畫質較佳的敦煌寫卷圖片進行文獻內容數位化與校對，不但便於使用電腦搜尋資料，更便於轉換成各種閱讀形式。

在總結與問答環節，聽眾踴躍互動。洪振洲老師表示，本校開發的專案十分歡迎各位使用，期望回饋相關意見，讓本校的專案變得更好。

## 佛典戲劇課程心得分享

## 千錘百鍊為一句

記得上「佛典戲劇編導演——生命教育之舞台實踐」第一節課，汪其楣老師要我們運用身體來「寫」名字，表演的過程必須靜默，不能說話，我覺得很好玩，表演真有趣。可是到後來要演戲，就感覺到困難。尤其我發音不標準，汪老師特別幫我安排正音的老師，受訓練習，矯正我的國語發音，也找了很多古典詩文給我讀，讓我熟悉文學的節奏和表達方式。

有時候很沮喪，像我練習說

一句母鹿的台詞：「我死不足惜……」老師舉了各種例子，告訴我怎麼表達，但我練了上百次還是沒辦法達成那種意境和口氣。母鹿好想哭，但母鹿繼續不斷地練習下去。

因為常常在家練台詞，母親也將我所有戲段的台詞聽得滾瓜爛熟。我講上一句，母親就會接下一句。比如我說：「人不可能不吃我們，人的王只答應……」母親就會立刻接：「不到草原上來獵殺我們。」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我還不會，媽媽怎麼就會了！而且母親把台詞念得很自然，我聽她念，比自己拼命用力練還容易感動，她真是我的專屬助教。排練豐子愷護生畫集那一段時，母親也聽得會背了。當她平易真誠地說出這個故事的全文，我竟馬上感動得流淚……原來表演需要一種人生的「火候」。

我還是慶幸自己通過戲劇的淬鍊與要求，在演戲過程中，我真誠地把自己變成劇中角色；演完之後我覺得自己變勇敢了！就是那一步，我跨出去了！我盡全力把它完成了！我跟上劇組的節拍，沒有掉拍，這是最開心的事。



▲《悠悠鹿鳴》劇照（李東陽攝），作者黃齡瑤（中）與歐陽如娟（右1）飾演母鹿，孫馨平（左1）飾演小鹿。

◎黃齡瑤（飾演《悠悠鹿鳴》之母鹿）



▲ 5月20日輔大宗教學系顧孝永神父（右3）、天主教學術研究院黃漢婷老師（右1）帶領輔大學生來訪，本校佛教學系主任鄧偉仁老師（右2）導覽圖書資訊館。

## 宗教交流 輔大師生蒞臨參訪

◎陳陶

5月20日輔仁大學宗教交談中心蒞臨本校參訪，由輔大宗教學系顧孝永神父、天主教學術研究院黃漢婷老師帶領神學院、宗教系、心理系與歷史所等不同系所之學生，與本校佛教學系主任鄧偉仁老師所教授之「佛教現代化與全球化」課程學生進行交流。

經雙方師生相互認識後，鄧老師首先介紹法鼓山三大教育、本校的辦學理念、研究與修行並重的特色，以及佛教學系著重於學術專業、實用佛法與接軌國際的方針。輔大學生來自不同的系所，雖然有些同學對於佛教不是特別了解，但都抱持著相當開放的心態。顧神父則介紹基本的天主教教義以及輔仁大學的特色，認為耶穌基督是要救度這個世界，要相信自己和別人都是天主所愛的、支持的，生命是有意義的。輔仁大學作為臺灣第一所創辦宗教學系的學校，不僅要學習

每個宗教的教義，更重要的是要從自己的宗教經驗回答生命的問題。

其後，雙方師生對重要的宗教議題進行深入的討論，比如輔仁大學現在僅有大約1%的學生是教友，如何在學校營造良好的宗教氛圍？在科學和理性為主導的現代化社會，有人認為「人不是上帝創造的，相反，上帝是人創造的」，應該如何回應這樣的問題？這些議題也許沒有最終的答案，但是在討論的過程中，就能夠激發大家對宗教與社會的相互理解。討論結束後，鄧老師為輔大師生導覽法鼓山，介紹聖嚴師父開山創校的歷程以及本校的禪悅境教。鄧老師表示，未來也希望安排本校學生前往輔大參訪，期許兩校之交流可以延續下去。因為在宗教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時代，不僅是佛教各個傳統之間需要對話，佛教也需要與其他宗教進行跨宗教的對談，共同分享經驗與智慧。

#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A long-haul collaborative project of the Āgama Research Group and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Āgama Research Group, director; Visiting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DILA)

In the first of this four-part series that came out in issue no. 31 of DILA Newsletter I introduced Śamathadeva's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the text on which the Āgama Research Group and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have been engaged with in a long-term digital project started in 2011. In this second part I am going to share what brought me to work on this text and initiate this project—indeed various causes and conditions (因缘) that favourably came together. As follows.

## Early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ravāda practice and Mahāyāna studies

Now, I had been a lay Buddhist practitioner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had been studying Indology, Indo-Iranian philology and Tibetology at the 'Orientale' University of Naples for the previous 11 years or so when, in 2008, I was a PhD student spending in Japan my last year of doctoral research.

By way of background: in Italy there was no subdivision into BA and MA courses. One would simply enrol in a university program—lasting 4 to 6 years. All Asian studies curricula had a modern spoken Asian language as a compulsory base. This was in addition to a second either modern or classical Asian language. In my case I wanted to study ancient Indian languages and philosophy and so I chose Sanskrit. (Pali was not offered at any Italian university, and I had been studying it on my own for some time.) For the modern language I took up Tibetan as this was the only one that—to my uninformed knowledge—would have been of some use to the study of Indian Buddhism!

The Italian academic tradi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was not at all strong in the area of early Buddhism—nor of Theravāda, for that matter—whereas it was renowned for the study of the Indo-Tibetan Vajrayāna traditions. Thus during my years at Naples University it wa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Theravāda tradition did not equate with 'early Buddhism' as such. We were never instructed tha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Āgama and Vinaya literature was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early Buddhism. The idea of 'buddhismo antico' (early Buddhism) was rather fuzzy and either implicitly related to an a-historical construct of 'primitive Buddhism' or, as a matter of fact, conflated with Theravāda.

I ended up not pursuing academic specialisation closest to my main scriptural and practical interest in early Indian Buddhism but I focused on Tibetan and then Khotanese texts. My graduation thesis consisted of an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an unpublished Tibetan text of the bon tradition. My PhD project was on the formative stage of bodhisattva texts and ideologies in Khotan. One factor impacting this trajectory was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ravāda practice community I happened to be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which was rather anti-scholastic and uninterested in the textual tradition. I felt somewhat deterred from studying academically something that was nevertheless so close to my practitioner's heart. Another factor was the stronger scholarly and personal affinity felt with my MA and PhD



▲ The late Professor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supervisors, more important to me than the subject matter we would be working on.

## First steps and deep dive into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and teachings: with Bhikkhu Anālayo and Karashima Sensei

So now, back to 2008, there I was, in Japan, studying Buddhist phil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te Prof.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as a visiting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RIRIAB) at Sōka University. All of a sudden I found myself immersed in a world of students, scholars, libraries and an academic tradition that was doing first-hand research not only on the Mahāyāna sūtras I was working on for my PhD research, but also on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both Āgamas and Vinayas.

I had alread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venerable Bhikkhu Anālayo about a year or so before going to Japan in early 2008. We had started to collaborate and exchange ideas and I ha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hi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early Buddhist discourses in Pali, Chinese, Sanskrit, Tibetan and other languages. One source that would from time to time come up in Bhikkhu Anālayo's papers was precisely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 continued to remain ignorant of the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text except for having become aware that it contained canonical



▲ Venerable Bhikkhu Anālayo (無著比丘)

citations of discourse parallels to the Nikāyas and Āgamas.

By attending the late Prof. Karashima's reading groups of Central Asian Sanskrit manuscripts (the Brāhmī Club),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Āgama transmission became more apparent. Around the same time my collaboration with Bhikkhu Anālayo intensified. The Vinayas and the Āgamas in their multilingual witnesses became part of my daily life. And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no longer extant in Sanskrit but only in Tibetan translation—truly came to life in my inner and outer world at once.

## Meeting Honjō Sensei

I came to know that Prof. Honjō Yoshifumi (本庄良文), who had compiled a table of Āgama sūtra quotations and parallels in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that I had first seen referenced by Bhikkhu Anālayo), was a living scholar, a committed priest in charge of an important Pure Land temple, and a professor at Bukkyō University in Kyōto. Prof. Honjō had also translated the entir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into Japanese in instalments, over a period of nearly three decades.



▲ Professor Honjō Yoshifumi (本庄良文)

A plan begun to form in my mind that perhaps once my PhD thesis and examination was over, I could return to what I now had the scholarly framework to call by its name: the study (so integral to the practice)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and teachings. With a few exceptions,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who are proficient in classical Tibetan are interested either in the study of Mahāyāna scriptures or in the Indo-Tibetan scholastic traditions. I felt a sense of purpose and joy thinking I could put my knowledge of Tibetan to the service of the field of early Buddhist studies and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uddha's liberating teachings at large. It seemed that at long last my life as a scholar and my life as a practitioner were more fully aligning for my own benefit and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I was later awarded an extension of my Bukkyō Dendō Kyōkai scholarship and was



▲ Professor Peter Skilling (Bhadra Rujirathat)

able to return to Japan (except for a brief spell back to Italy when I had to defend my dissertation). I spent another 9 months in Kyoto. Through the hospitality of Professors Silvio Vita and Funayama Tōru (船山徹) at the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Kyōto University, and the care of Professors Hiraoka Satoshi (平岡聡) and Fukita Takamichi (吹田隆道), I was finally introduced to Prof. Honjō, reportedly a very reserved, gentle and impeccable scholar and person.

I remember vividly our first encounter in his office. And then many more weekly meetings to come when attending a study group at Ōtani University. On that very first meeting, Prof. Honjō had me promise that alongside a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I would also prepare an edition, something he had not done and was not planning to do. To that end, he generously shared a digitised text of the Peking edition of the text, alongside his heartfelt trust and encouragement. Like all my teachers and benefactors, he seemed to believe in me—or my potential—more than myself.

## Ācāriya Peter Skilling's notebooks

At the ARIRIAB I had also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getting to know the great savant Prof. Peter Skilling (Bhadra Rujirathat), who had read through the entir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for his own edification when he was studying sūtra literature in Pali and Tibetan in Bangkok, as well as having published a handful of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of sūtra quotations in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back in the 1970s and early 1980s.

In fact Prof. Skilling and Prof. Honjō had worked and published independently but simultaneously. When I informed him of my intention to work on this text, Prof. Skilling readily shared with me his ancient handwritten reading notes. They came contained in precious and fragile notebooks—all made in Japan!—that later on my friend and then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student Woon Wan-ru (溫婉如) carefully colour-scanned for us. He also shared his own digitised text of the *Abhidharmakośopāyikā-ṭīkā*,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Tibetan scholar, via Dr. Christoph Cüppers of the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Nepal (an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the Japanese Reiyūkai).

(part 2 of 4; to be continued)